

内容简介

布拉格出身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是本世纪西方文学一颗耀眼的慧星，与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起被称为“现代文学之父”。本书以流畅的笔调，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卡夫卡何以成为世界文学巨星的历史、社会、民族、文化、家庭等诸多因素，扼要地概括了他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观点、主要艺术表面特征以及国内外反响，熔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炉，对于了解卡夫卡其人乃至西方现代文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现代文学之父
——卡夫卡评传

他在一个“孤岛”上树起 了“非文学”的大纛

在现代西方文坛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本世纪最大的事件，它领导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文学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文学的面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当它刚露头角的时候，是以“非文学”的“怪脸”出现的，除了很少的同调者以外，人们都不把它放在眼里，曾几何时，它成了气候，掀起轩然大波……。

比这股大潮本身更令人瞩目的也许是，它的先后出现的一批弄潮儿中，一位举大旗的人物不是来自文艺复兴的故乡，不是来自新思潮最活跃的法兰西，也不是来自德意志文化的本土，而是来自欧美几个公认的文学大国以外的东欧一隅——波希米亚，准确地说来自波希米亚所在的捷克首府布拉格。但也不是来自布拉格讲捷克语的民族中，而是来自只占这个城市十五分之一人口的少数讲德语的居民中。这群居民中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弗茨茨·卡夫卡（1883—1924）就把现代主义文学插在这个东欧名都的德语孤岛上！这可谓“咄咄怪事”。

然而，比这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布拉格这个德语孤岛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恰恰在卡夫卡这一茬上，出了一批造气候的弄潮儿，一起作浪兴波，其影响波及全世界。除卡氏外，有本世纪德语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里尔克，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诗人、小说家弗茨·韦尔弗、杰出小说家梅林克、被誉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开拓者基希、社会主义诗歌奠基者福克斯……。这使得当时布拉格德语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卡夫卡从大学年代起就有可能参加他们的活动，并同其中的好些人结下了友谊，这使卡夫卡成为时代巨匠并开一代新风的大家。现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他和法国的马采尔·普鲁斯特（1871—1922）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等，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祖师。但卡夫卡本人并没有倡导过什么学说，建立过什么流派，或组织过什么文学团体，他的“祖师爷”地位，是他的作品本身带来的，是时间考验出来的。作者生前并没有享受到这个荣誉，因为他生前只发表过少量的短篇小说，它们在马克斯·勃罗德于1950年编纂的卡夫卡九卷集中，只占一卷的篇幅，而且在作者生前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卡夫卡的影响是在他死后，是在他的这位挚友勃罗德陆续整理出版了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特别是1935年第一次出版了他的六卷本的文集以后，先在法国，经过加缪等人的宣传，很快扩大到英美，形成一股“卡夫卡热”。各种有影响的流派都向他攀亲结缘：从他的作品中，存在主义文学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荒诞派看到自己所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看到了讥讽意味和含泪的笑；超现实主义看到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了梦幻幻想和直觉……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五十年代后半，这股热潮涌进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同时引起西方某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的重视，他们纷纷发表评论。1963年，当卡夫卡八十周年诞辰的时候，他的故乡布拉格举行了国际性的卡夫卡讨论会，与会者主要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界代表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尽管会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提出全盘否定卡夫卡的理由了。

如今，卡夫卡的热潮仍在继续扩大，不仅卡夫卡和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的对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专著数以万计，而且在西方的大学课堂里，卡夫卡也是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现在有人认为，当代美国文学“没有卡夫卡是不可想象的”，卡夫卡对于二十世纪“英国浪漫派作家起了最强烈的影响”；他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先声”；“今天几乎没有一篇德语的小说散文不曾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他的影响”。我们今天来介绍卡夫卡，不是为了要赶这股“热”，而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首先，既然卡夫卡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这样密切，既然那么多的流派都与卡夫卡的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那么，不了解卡夫卡而要读懂现代的西方文学，恐怕是有一定困难的，其次，卡夫卡是个在艺术上具有借鉴价值，而且也有认识意义的杰出作家。因此也可以说，卡夫卡是通向西方现代文学的“入门书”，或者说是西方现代文学的 ABC。

他从文学“外”走来

今天的卡夫卡在西方简直成了传奇式的英雄，然而在近代文学史上，恐怕很难找得出第二个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象卡夫卡在生前那样默默无闻。他为人温和友善，内心却十分孤独。他把他的烦恼、抑郁、不平、痛苦……一切的生活感受都埋藏在心底，通过认真的思考，然后用他的笔不倦地表达着。他除了短期的养病生活，几乎一生都没有能够离开过阻碍着他的创作的普通公务员的职务。他在私生活上也是不幸的：有过多次恋爱，甚至三次订婚，但都因事业心的要求或家庭的阻挠而没有成婚。他在父母的家庭里也没有得到过温暖。在大学里学了短期的语言文学后，就迫于父命转修法律，毕业后，从1908年起，他带着博士学位在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直到1922年因病辞去。因为他是犹太血统，在社会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卡夫卡是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但他从出生到死的绝大部分年月都在布拉格度过（最后几个月去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并在那里病歿），这个地方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它的统治者在欧洲的专制反动是很有名的，富有正义感的卡夫卡深深感到压抑。

卡夫卡这种无权、无势的社会地位和精神上的压抑感，决定了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他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社会的不公，而同情下层的劳动人民，认为“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他同情工人运动，同情社会主义，甚至同布拉格的某些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有接触。他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对奥匈帝国参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持消极态度。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年代就开始钻研戏剧，喜欢阅读易卜生、尼采、达尔文、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马克斯·勃罗德结为知交，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这时期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和德国戏剧家赫贝尔。就业以后他对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强烈共鸣，也对中国的老、庄哲学发生浓厚兴趣，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影响。

卡夫卡的创作生活是极为勤奋的。在他创作旺盛期的十二年内，其中七年被病魔纠缠着，尽管如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下三百万字的东西，包括书信、日记在内。同时他的创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他对自己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不满意，在他晚年不止一次写信给勃罗德，带遗嘱性地要求对方把他的所有著作“尽行焚毁”。富有眼力的作家勃罗德，早在1916年就发现了卡夫卡作品的不寻常意义，他当然没有照他的遗愿去做，他把卡夫卡的手稿一一加以整理出版，先后两次负责主编了卡夫卡的全集。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得以保存下来，首先应归功于他的这位诤友。此外，勃罗德还写了卡夫卡传记和专论，提供了关于卡夫卡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德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曾与笔者谈到，在德国文学史上，“一再冒出那么个别的人，他看起来好象与文学毫不相干。但是他在写。他写的事物实际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这是传统中没有过的”。因此马耶尔始终认为，“卡夫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伟大、最独特、最有成就的作家”。

他的作品不同凡响

卡夫卡最初写了些模仿性的诗歌和短剧，都没有保留下来。他早期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断片小说《乡村婚事》（一译《乡村婚礼筹备》，1907）和1912年出版的短篇集《观察》。卡夫卡的主要成就是1912年以后写的一系列小说，其中长篇共有三部：《美国》、《诉讼》、《城堡》；短篇小说共有七十八篇，其中半数以上为千字以内的“微型小说”或速写，较重要的有：《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为科学院作的报告》、《中国长城建造时》、《猎人格拉斯》、《饥饿艺术家》、《狗的探索》、《地洞》等。此外，卡夫卡还写了一篇有名的长信《致父亲》，是研究卡夫卡的重要文献。

卡夫卡的作品需要用多种方法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研究。但是西方有些学者把卡夫卡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或者从宗教立场出发，或者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着眼，避开卡夫卡作品中的社会批判这最有意义的部分，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从而把卡夫卡的研究引入唯心主义的迷宫。

其实卡夫卡并不神秘，他的作品既不是宗教式的神谕，也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例证，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抗议书，社会批判和揭示人类文明的堕落构成他的作品的中心主题。这是毋庸置疑的，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是最好的说明。特别是《诉讼》与《城堡》，显然提供了更多的让我们窥见卡夫卡的思想、艺术特色的资料。从成书的时间看，《美国》最早，作者曾拟用《销声匿迹的人》的书名，现在的书名为勃罗德所加。小说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名字里往往都少不了一个“K”字）是个十六岁的纯朴男孩，由于受一个中年女仆的引诱，被父母驱逐到遥远的他乡——美国。在纽约码头的轮船上，卡尔为一个受人欺侮的司炉工打抱不平，反而招来麻烦。这时突然来了一个身份为参议员的百万富翁，声称是卡尔的舅舅，把他领到家里。但两个月后，这位“舅舅”就借口卡尔违犯了自己的家规，把他撵出家门。卡尔在一家客店结识了两个流浪汉，叫罗宾孙和德拉马什，这两个家伙把卡尔看作是敲榨勒索的对象，对此卡尔并不在乎，但当他们不尊重他母亲的相片时，他才愤然唾弃了他们。接着卡尔很快又受到“西方大旅社”的女总厨师的垂怜，给他找了个在旅社开电梯的差事，但不久由于偶然擅离职守，被警察追捕，这时德拉马什突然出现，掩护了他。于是卡尔又落入这个流氓的手里，当了他和他姘妇的仆人……小说没有写完。

《美国》是卡夫卡长篇小说最近似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读者随着主人公的行踪，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情景和工人结社、罢工游行以及资产阶级党派斗争等场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矛盾和弊病是有所认识的，他的同情是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一边。小说的色调不象作者其他作品那么灰暗。作者在日记中说过，这部小说是“对狄更斯的不加掩饰的模仿。”所不同的是卡夫卡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只是客观地、冷静地叙述，而不象狄更斯那样具有更鲜明的倾向性。小说题名为《美国》，但写的并不是特定的、具体的美国（作者从未到过这个国家），而是卡夫卡虚构的普遍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

如果说《美国》还只是部分地具有卡夫卡的艺术特色，那么《诉讼》^①则完全是“卡夫卡”式的了。^②

小说的内容不象《美国》那样具体，而更具抽象化。主人公约瑟夫 K 是一家银行的襄理，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晨，突然被秘密法庭逮捕，却不宣布他的罪状，行动仍然自由（小说第八章有交代：这是跟刑事案件不同之处）。法庭设在一个仓库的阁楼上。约瑟夫 K 自知无罪，他不想逃跑，而只一心想把案子搞个一清二楚。为此他去向熟悉的几个女人求助，却找律师申诉。他从律师那里得知：法院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徇私舞弊、贪污贿赂、官僚主义，种种弊病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他又去找法院的画师打听自己的罪名。画师告诉他：“法院一经对某某人提出控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谁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约瑟夫 K 鉴于律师九个月也写不出申诉状，决定解聘他，因而遇见了律师的一个当事人（谷物商），他告诉约瑟夫 K 他为了弄清自己的案子折腾了二十年，不仅弄得倾家荡产，而且人也搞得精疲力竭，而递上去的所有呈文“全部变成了废纸”……约瑟夫 K 在一次陪外宾参观大教堂时，那里的牧师对他讲了法典上一个“门警的故事”，晓喻他：真理是有，但通往真理的道路障碍重重。小说的结局是，一天夜里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把约瑟夫 K 架走了，在一个荒废的采石场上拔刀把他刺死——这是法院对约瑟夫 K 的最后审判。

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与一般同情弱者、暴露黑暗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区别不大的话（当然，艺术表现方法是迥异的），那么，在结尾部分，“卡夫卡特点”便很明显了。约瑟夫 K 作为被告，他是受害者，他被法庭抛到被压迫的人群中来，开始品尝到那些经常在他所任职的银行大门前哀哀无告者的酸辛；作为银行襄理，他又是个不大不小的官，是跟法庭以及无数类似的官僚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的一员，他也曾象法庭对待他那样对待过向他求救的人们，因而他渐渐感到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人，理应受到正义法庭的制裁。因此当最后两个执刑的刽子手拔刀相见时，他束手待毙，丝毫不加抵抗。

《城堡》篇幅最大，也是未竟之作，但更具卡夫卡的特色。主人公 K 踏着雪路，要去城堡——统治阶级的衙门所在地——要求当局批准他在附近村子里安家落户。城堡就矗立在前面小山上，看起来近在咫尺，向它走去时却象有千里之遥。他就冒称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先进村子找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城堡的长官 CC 伯爵人人皆知，可谁也没有见过。K 就想去找有关当局的负责人克拉姆，为此他在一家小客店勾引了克拉姆的情妇弗里达，但她也不能帮助他达到目的。K 又把希望寄托给他的房东、克拉姆的通信员巴纳巴斯。一天巴纳巴斯给他送来克拉姆的两封信，但一看，这是从档案柜里翻出来的多年前的旧指示。K 仍不甘心，继续写信要求克拉姆接见。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屈尊去当学校的门房。但后来巴纳巴斯的妹妹奥尔嘉向他透露：哥哥自己也从未见到过主人。最后克拉姆的秘书索尔梯尼命令 K 立即把克拉姆的情妇送回客店。于是 K 与城堡之间的一切联系的可能性都断绝了……小说写到二十章为止。据勃罗德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K 在弥留不，终于接到城

^① 这部小说共十七章，其中完整的有九章，各章顺序为勃罗德所编排，初版于 1925 年，一译《审判》。

^② 小说的内容不象《美国》那样具体，而更具抽象化。主人公约瑟夫 K 是一家银行的襄理，在他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早晨，突然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却不宣布他的，1967 年版，29 页。下同。

堡来的通知：可以住在村里，但不许进城堡。

卡夫卡没有给他的《城堡》规定时代背景和地理空间。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K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想在村子里落个户口，进一次衙门却比登天还难。这说明统治阶级和老百姓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卡夫卡的几部主要作品都涉及到官僚制度的问题。他认为官僚制度是对人的生存的致命威胁。这个城堡，不仅它的主要统治者 CC伯爵是个永不露面的神，官僚们高高在上，“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而且作为统治机器的官府也是似有却无，衙门里的大小官员很多，而且相当忙碌，但他们唯一的工作内容似乎就是跟卷宗打交道，老百姓的痛痒却无人过问。

小说通过许多穿插的故事，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鞑，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巴纳巴斯一家的遭遇集中反映了这一主题。巴纳巴斯的妹妹奥尔嘉愤慨地说：“在贵宾招待所那些跟班老爷们的眼睛里，我只是一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任意摧残我。”奥尔嘉的妹妹阿玛利亚揭露说：克拉姆“能够一动不动地呆坐几个钟头，然后忽然做出些残暴行为，令人吓得发抖。”“克拉姆对女人简直是一个暴君，他叫一个女人来，然后再叫一个来，没有一个是玩得久的，一玩厌了又叫她们走。”后来，阿玛利亚因为拒绝了克拉姆的秘书索尔梯尼的求婚，全家陷入极大的恐惧，结果亲友邻人们疏远了，父亲鞋铺里的伙计也跑走了，最后倾家荡产。这就是城堡管辖下的老百姓的命运。

贯穿于长篇小说中的那种层层叠叠、似虚似实的官僚专制统治的母题也出现在卡夫卡某些短篇小说中，《中国长城建造时》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哲理性小说以冷峻笔调叙述了中国老百姓根据统治者的意志，从全国各地被征调去修筑并无实际防御价值的万里长城，但“他们并不知道现在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现在叫什么朝代都还存在着疑问。”在卡夫卡的笔下，这里的长城是人类一切徒劳无益的劳动的悲剧性的象征。

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残忍方面，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最为惊心动魄。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上司（上尉军官）的尊严，就被处以死刑，执行时，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刺字、刻图案，让犯人活活地经受十二小时的肉体折磨后再死去。然而，比杀人本身更残忍的是那个亲自执行的军官，他表现得简直就象操作一部生产机器那样若无其事。而当他发现新来的司令（法官）要废除这种刑罚，他不动声色地从机器上卸下犯人，又无动于衷地自己躺了上去，亲自操作机器把自己杀死，充分表现出一个决心与自己的杀人机器同归于尽、甘为旧制度殉葬的死硬分子的狰狞面目。

反映一部分普通老百姓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和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是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为科学院作的报告》就是这方面的名篇之一。它写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在这只猿猴找到“人类的道路”以前，它被关在一只很窄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但它要的并不是一般摆脱笼子的自由，而“仅仅是出路”。作者把“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著名口号改变为“找不到出路，毋宁死”。小说狠狠地嘲弄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自由的空谈：“人类上自由两字的当，似乎上得太多了。”

这个动物故事，也是人类文明演化过程的一个譬喻。运物题材是卡夫卡

常用的题材，他认为动物间的关系，比人与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所以与动物更好相处。于是动物常常成为他暗喻或反衬人类关系的一种手段。

卡夫卡有一部分作品是以表现父子冲突为内容的。1912年写的《判决》是最著名的一篇。主人公盖奥尔格·本德曼决定把自己与富家小姐订婚的消息告诉侨居在彼得堡的好友，但他的父亲背着他就那位朋友写了不少信件，包括上述消息，使那位朋友对盖奥尔格的友谊变得冷淡。当盖奥尔格发现了父亲这种行径时，斥责了他父亲一句话，因而被父亲当即判处投河自杀。盖奥尔格果然就按照父命执行了。小说包含了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在内，是作者最珍爱的作品之一。

二十世纪初以来，艺术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是不少作家、艺术家接触到的主题。卡夫卡晚年也在这方面写出了他的著名小说《饥饿艺术家》。它写一个艺人以饥饿为表演手段，曾经名噪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观众的兴趣被马戏团吸引了去。他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孤独地、自觉地饿死在他借以表演的铁宠子里。这一主人公的形象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出路的艺术家的悲哀，也可以认为是作者的自审，是个艺术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形象。

卡夫卡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当推《变形记》，但它已广为我国读者所熟悉，本书中涉及又较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他的人物画廊的“非英雄”群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都是正直善良的老百姓，属于一般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性格的明显烙印。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防守型的弱者，在他们被动的精神状态中大致有这么五种——用作者的话说——“人类的普遍弱点”：孤独感、恐惧感、软弱性、负罪感、虐待狂。第一种本书其他场合已有专论，这里着重谈一下后四种。

恐惧感在卡夫卡的精神状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的书信、日记里写到的那种莫名的恐惧随处可见。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感到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惶惶不可终日。《城堡》中的K惟恐天有不测风云，即使在夏天，也担心“会下雪”。最典型的是《地洞》这篇小说，主人公“我”是一只不知名的动物，它挖了个很大的地洞，却时刻害怕外界敌人的袭击，成天疲于奔命地一会儿补东壁，一会儿堵西墙，一会儿巡逻，一会儿放哨。“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而“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可“危险迟迟不来、而又时时担心着它来”。这篇写于1923—1924年的小说对主人公的这种恐惧症描写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奥匈帝国的恐怖统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灾难感，也生动描绘了自然界甚至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普遍生态。

卡夫卡的人物都是“非英雄化”的，是现代主义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满，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因而在时代的风云激荡、社会上各阶级较量的时刻彷徨不前，拿不出行动的力量，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地洞》中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主人公便是对这类人物的心态的刻画。它说：“我从未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但是，对于别人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都是无力抵御的。”所以一旦强者进逼，“就把我的贮藏品分些给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象这类胆小怕事但心地善良的人，也不失为较好的公民，若从正确的观点和角度去表现，也能塑造出多种性格和有意义的典型来。文艺作品不等于生活本身，它应该比实际生活具有更多的层次和色调；高明的作家既能进入“自我”，又能跳出“自我”，居高临下；既能作“点”的深入，也能作“面”的概括，驰骋自如。卡夫卡从“自我”出发的视角，固然能集聚强光把作者的视线带入“点”的深层，但它撇开了“面”的整体，也隔断了与整体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的人物画廊与传统小说的人物画廊的显著区别之一。那些人物仿佛都以卡夫卡的“自我”为母题的各种“变奏”。卡夫卡对于自己的软弱性是深有认识的，他在笔记里写过这样箴言式的自白：“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道：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共同的是‘一切’。”^①而卡夫卡想通过自己的弱点写出所谓“人类的普遍弱点”也是自觉的。他写道：“我知道，生活上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跟我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把我的时代的消极面有力地吸收进来。”

^① 卡夫卡：《〈乡村婚事〉和其他作品》第204，1980，德文版

①故有人称他为“弱的天才”。②

卡夫卡的“负罪感”不同于《圣经》里讲的基督徒的“原罪”；它可以说是卡夫卡的“新发掘”，是他特有的一种情感。在卡夫卡的书信日记中充满了自怨自杀的情绪。这是由他的二重人格造成的。在他的性格中，有他软弱、妥协的一面，又有叛逆、反抗的一面。在家庭里，他对父亲的家长制粗暴作风十分不满。但又敬佩他的精明强悍，并为自己作为长子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的、能对家庭尽更多义务的儿子而内疚。他看到家里的职工随时受到父亲的怒骂而深表同情，同时又为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对工人感到有罪。如此等等。

卡夫卡把自己的这种负罪感折射到他的人物身上，造成人物形象扭曲，使他们在遭遇无妄之灾时，态度不能始终如一，往往由抗议变为顺从、妥协以至于完全屈服。最典型的例子是《诉讼》主人公约瑟夫 K。起初他对于法院对他的无端逮捕表示愤慨，甚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法院的“藏污纳垢”、“贪赃枉法”，但是，他的反抗情绪不是随着诉讼的失败而激昂，相反，它渐渐平息了下来，最后毫无反抗地服从了死刑的判决。而他服刑时态度之所以那么泰然，除了绝望，还有他内心一个“必然”的声音支持着：原来这场莫名其妙的诉讼震动出了他意识中深藏的“罪恶感”，使他醒悟到：他在国家法庭面前固然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在正义法庭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有时也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哀哀求告的穷人，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庭对待他那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构成整个社会“异化”力量的那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在恶的社会总量中也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份。那么，他的逮捕和被审判不是合乎天理的吗？

卡夫卡这个负罪的观念是一贯的，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行动。”①因，此他经常提到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挣脱出来”，②而跳出来的唯一可能就是死亡。难怪，约瑟夫 K 虽然看到法院内部的极端腐败，却看不到任何一个有罪责的法官。原来罪责就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这种观点，如从社会学观点去看，不仅模糊了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界线，而且冲淡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或者说，把它的罪恶分摊到全人类的头上，仿佛造成人间一切痛苦的罪恶人人都有份。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律不见了，从而堵住了人们去追寻他的人物“被抛掷”命运的剥削根源。这样，卡夫卡用文学手段揭开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部分真实，又用二律背反的逻辑方式重新给掩盖起来了。但若用现代哲学来解释，则负罪感是现代人自审意识的出发点。

卡夫卡笔下还有一些“虐待狂”的形象，他似乎要通过这些人物一直掘进到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挖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一种残忍的本性。给人印象最难忘的是《在流放地》中那个既象中世纪时代又象法西斯式的上尉军官的形象。他用一台特制的行刑机器极其残酷地处死他的士兵。但后来流放地来了新的司令，宣布废除这一刑罚制度。上尉军官则毫不犹豫地、而且泰然

① E·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

② E·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第 280，德文版

③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④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563 页，1951 年版。

自若地躺到同一台机器底下，让它来折磨自己……这里卡夫卡刻画了一个既是虐待狂又是殉道者的形象。

人格结构

一个失落了身份的精神漂泊者

卡夫卡是个矛盾的、复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他的犹太民族的身份象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卡夫卡又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因而，受歧视的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直到后来，他在向他所钟情的女子密伦娜表达爱情的时候，仍掩饰不住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感叹道：

您想一想，密伦娜，我是怎样走到您的身边来的，我已经走过了怎样的 38 年的人生旅程啊，因为我是犹太人，这旅程实际上还要长得多。

①

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写给密伦娜的另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的难堪处境。这处境对于卡夫卡是不可忍受的。他在给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

完完全全无家可归，非发疯不可，日益虚弱，毫无希望。②

这番话当然是由于在休养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直接引起的，是牢骚话，但根据他多处流露的情绪，尤其是在其他书信、日记里记述或提及的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歧视、欺凌的情形，这番话不啻是对他的民族境遇的一种慨叹。晚年在给密伦娜的又一封信里，表达了对对方有祖国的羡慕和自己“寻找一个祖国”的渴望：

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有谁生下来就没有祖国呢？绝无仅有的例子偏偏发生在卡夫卡身上！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验。因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小说主人公 K 欲进城堡耗尽了毕生精力，最后仍未能进去。这番描写反映了他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失落感。作为犹太作家的勃罗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

② 卡夫卡：《致菲莉斯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1982 年版，750 页。下同。

③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3 页。

德，他对《城堡》的这一层意思看得还要深刻，他说卡夫卡在《城堡》“这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②

以上论及的还只是我们考察卡夫卡的“失落感”的第一个层次。事实上卡夫卡的失落感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为没有祖国或找不到民族家园的“异乡人”身份在几百年欧洲犹太人中间不是卡夫卡特有的境遇。卡夫卡作为“异乡人”的特殊境遇是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不合拍的，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习用的是德语，操这门语言的人在布拉格城只占很小的比例（本世纪初约十五分这一左右），因此从语言环境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跟他的同胞中的其他出类拔萃者，如马克思、爱因斯坦、海涅、弗洛伊德等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卡夫卡身为犹太人，学的却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因此他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自由选择学校甚至专业，中学还可以在专门的德语中学学习，大学则必须在布拉格大学的德语分部。他的作品在自己的家乡不通过翻译就难以传播，他的社交活动和与文学界的来往基本上也局限在德语的范围内。我们不能把“环境决定论”绝对化，但卡夫卡所处的那种“孤岛”般的环境对这位“异乡人”的失落感或异己感所形成的胎记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他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也许还可以弥补上述的缺憾。可惜这又不从人愿。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学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跟“法”有关的职位。但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而且视创作为他“唯一的幸福”。他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不能得一以当时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过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创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和必需，换句话说，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个岗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一份固定的、优厚的薪俸，又有一个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但是创作需要时间，需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对于卡夫卡甚至需要紧闭在“孤寂的世界”的环境，这就使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放弃这一岗位是我的强烈愿望”，^①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②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使他觉得“几乎听见了我被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碎的声音。”^③1913年，卡夫卡的创作欲趋向高潮，职业的干扰给他带来的痛苦便更加剧烈：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既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再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

^② M.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载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81页。

^① 卡夫卡：1917年7月27日致K.沃尔夫函。

^② 卡夫卡：1911年3月28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2年12月3日致未婚妻F.鲍威尔的信。

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灭亡。^④

有时他甚至感到，这个该诅咒的职业，等于在他具有“幸福天份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⑤

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强烈的了！这是两种相反的力在撕裂着他：一种是要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兴趣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我价值；一种则是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习俗迫使他对他家庭承担起一个长子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是经济供养的责任。而他实在地无法做到成全任何一方，不得不忍受这二重分裂的痛楚。于是，白天他在办公室虽然“克尽职守”，而且与周围的同事们也能合群，但这在他看来只是浮在“生活的上面”，他的内心依然是孤寂的。只有夜晚，在写作的时候，他才能把“重心”沉入生活的“深入”，但这点时间是以牺牲睡眠为代价的，实际上是在损害健康，剥蚀生命，^①而这点时间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创作欲，或者说充分表达他的“庞大的内心世界”。

如果他有个温暖的家，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②便能得到温存，甚至融化，但他没有。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凭自己的精明强悍、体格健壮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女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在家里非常专断，要求家庭成员对自己绝对服从，动辄暴怒、斥骂。这给卡夫卡从小在心理上就受到很大损害，性格也因此向内倾斜。他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关心儿子，但更懂得服从丈夫。在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让父亲胜利。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心情压抑的。他前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判决》、《变形记》等，可以透视到他的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这两篇小说问世后不久，卡夫卡在1913年8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

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爱情，也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他认为：“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③为了婚姻，他曾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七年（1912—1919）的时间里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1919年卡夫卡在《致父亲》那封长信中慨叹：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事情。”

他的后半生在他为婚姻问题而争斗的中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也是悲剧性的爱的插曲：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少妇，

^④ 卡夫卡：1913年8月21日记。

^⑤ 卡夫卡，1911年10月4日日记。

^① 卡夫卡于1917年开始患肺结核，1924年死于喉结核，天年仅41岁。

^② 卡夫卡：1912年2月5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年版，319—320页。

^④ 卡夫卡：1910年7月19日日记。

她是布拉格长大的前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进，倾向苏联。他十分赞赏卡夫卡的小说。1920年初，她打算用捷克语翻译卡夫卡的作品，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从此她一见钟情，不久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很快达到从未有过的热烈程度。但卡夫卡对密伦娜的幽会要求总是怀着“恐惧”感。而密伦娜却是个典型西方式的开放性的女性，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她是受不了的。半年多以后，双方基本上友好地断绝了通信。

到了晚年，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卡夫卡才与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多拉·迪曼特产生了爱情。1923年7月，即卡夫卡逝世前不到一年在外地疗养时才认识多拉。由于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并且非常热情、诚悉心照料着他，深深打动了卡夫卡的心，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多拉最终成了他真正的生活伴侣。卡夫卡曾写信给她的父亲，要求父亲同意他与多拉的结合，并表示为此愿意皈依犹太教。多拉父女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父亲根据犹太教教士的意见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多拉一直陪伴他到死，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尽管如此，按照当时的西方习俗也不能算正式夫妻。

卡夫卡对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屡屡失败显然感慨多端。1922年1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喜欢正在爱恋的人。但我自己不能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究竟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在自己，还是在别人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在一则笔记里，卡夫卡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曾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好象是她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矛头朝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去撞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风，也就是向着我。假如向那姑娘挤过去，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尖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了。^①

总之，在别人唾手可得的東西，在他便成了问题，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他的境遇，他的命运。

就象前面讲到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的尖锐冲突时我们不能一味责怪他的职业本身一样，这里我们也不能片面责怪他的家人和任何一位情人，一切都应归因于卡夫卡与文学的缘份太深了，对它太酷爱、太痴情了。但是我们完全有必要揭示和阐明卡夫卡所处的这种种矛盾关系及其紧张程度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考察卡夫卡的个性的“独立性”形成的诸多因素，从而才能明了他那种“失落感”和漂泊感的因由。

联邦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价，他说：“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实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前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

^① 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353页。

^② 卡夫卡：《乡村婚事其他遗作》，法兰克福/迈因，1980年版，183页。